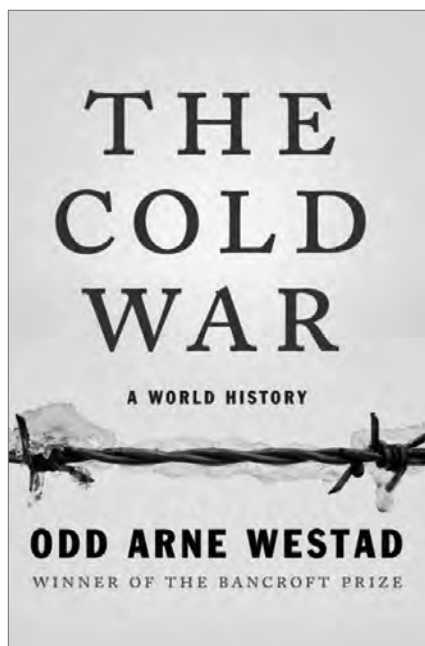


# 冷戰與當今世界

——評 Odd A. Westad, *The Cold War: A World History*

• 夏亞峰



Odd A. Westad, *The Cold War: A World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7).

## 一 史學淵源

冷戰結束以後，由於新檔案材料的公布，出現了「冷戰史學泰斗」、耶魯大學教授蓋迪斯(John L.

Gaddis) 所稱的「冷戰史新研究」的學術潮流。蓋迪斯出版了兩本重要著作，一本是1997年的《我們現在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戰歷史》(*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另一本是2005年的《冷戰：一部新歷史》(*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蓋迪斯是後修正學派的主要代表<sup>①</sup>，他的《我們現在知道了》一書，在利用1990年代以來冷戰研究新檔案材料的基礎上，主要討論冷戰前十五年的歷史，涉及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歐亞兩洲建立相互對抗的陣營、核武器問題、古巴導彈危機、德國問題、第三世界、經濟冷戰、意識形態和同盟關係等<sup>②</sup>。蓋迪斯強調冷戰的結束是西方領導人正確決策的結果，冷戰勝利的英雄是西方的強硬派和保守派，比如美國前總統里根(Ronald Reagan)、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和教皇保羅二世(John Paul II)等。蓋迪斯是以一種西方勝利者的自信來重新審視冷戰歷史的，他猶如一位大法官，居高臨下，在為一個案子做最後的結論和判決：「我們現在知道了」——

蓋迪斯是以一種西方勝利者的自信來重新審視冷戰歷史的。他的冷戰研究主要關注美蘇大國關係，屬於歐洲中心論，很少討論兩個超級大國在冷戰時期對第三世界的干涉及其產生的後果。

2017年，一部完整的以全球為視角的冷戰通史終於問世。文安立在《冷戰：一部世界史》指出，該著「試圖展現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進行冷戰對抗的重要性，揭示冷戰的各種表現形式以及令人目眩的不一致性」。

冷戰全是共產主義的錯。蓋迪斯的《冷戰：一部新歷史》則是一本冷戰通史性著作，主要關注美蘇大國關係，屬於歐洲中心論，很少討論兩個超級大國在冷戰時期對第三世界的干涉及其產生的後果<sup>③</sup>。

蓋迪斯的著作受到美國主流媒體的高度評價，被視為「冷戰史教科書」，但也有不少學者對蓋迪斯的一些觀點提出尖銳的批評<sup>④</sup>。著名的《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於2006年3月23日發表時任紐約大學教授、已故著名歐洲史專家朱特(Tony Judt)的長文，對蓋迪斯的《冷戰：一部新歷史》展開全面批判。此前，美國很多政要和著名學者包括蓋迪斯在內都公開支持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入侵伊拉克的政策，認為小布什政府應該而且能夠使中東實現民主化。朱特則是公開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的少數著名學者之一。在這篇書評中，朱特指出，「蓋迪斯寫的是一部美國冷戰史，是從美國的角度、基於美國的經驗、以最適合美國讀者口味的敘述」寫成的著作。蓋迪斯是以一位美國外交史專家的視角來寫這部冷戰通史的。他對蘇聯和東歐國家冷戰歷史的了解和書寫非常膚淺、對西歐是「鄙視的」，第三世界的冷戰史在書中幾乎被忽視。朱特認為，儘管蓋迪斯在冷戰期間出版的很多著作充滿智慧，但在柏林牆倒塌之後，蓋迪斯成為「美國勝利論者」，對冷戰時期兩個超級大國對第三世界所造成的巨大傷害根本不予關注。朱特由此斷言，蓋迪斯的《冷戰：一部新歷史》是十分片面的，「冷戰的故事仍有待全面講述」<sup>⑤</sup>。

## 二 主要觀點

2017年，一部完整的以全球為視角的冷戰通史終於問世，「冷戰的故事」得以重新全面講述，這就是《冷戰：一部世界史》(*The Cold War: A World History*)，引用只註頁碼)。這部新著的作者是當今國際史壇最有影響力的冷戰史專家、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美國與亞洲關係李成智講席教授文安立(Odd A. Westad)。文安立在導讀部分開宗明義地指出，該著「試圖展現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進行冷戰對抗的重要性，揭示冷戰的各種表現形式以及令人目眩的不一致性」(頁17)。

「冷戰」是甚麼？文安立認為，冷戰是一種「國際體系」，與十六、十七世紀的英國和西班牙兩極對抗、十一世紀中國的宋朝和遼國的兩極對抗有類似之處。這種國際體系的特點是兩極意識形態尖銳對立，積極動員盟國參與各個領域的激烈鬥爭。文安立在導讀中寫道：

冷戰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競爭，這種競爭在1945至1989年之間達到頂峰。不過，冷戰的根源在時間上可以追溯到更早，其影響我們今天還能體會到。在其鼎盛時期，冷戰構成一種國際體系，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世界上的所有大國當時的外交政策都與冷戰有關。與冷戰相關聯的思想和意識主導了其國內人民生活的話語。然而，即使在對抗最激烈的時期，冷戰是世界的主導力量，卻不是唯一的力量。二十世紀後期許多重要歷史發展，既不是冷戰創造的也不是由冷

戰決定的……冷戰對抗鞏固了由超級大國主導的世界，而在這個世界，強權和暴力——或者說暴力的威脅成為國際關係的準則。信仰變得絕對化：只有自己的制度是好的，別人的制度本質上就是邪惡的。(頁1-2)

在導讀的結語部分，文安立作出如下論斷：「冷戰是美國力量的崛起和鞏固，但絕非僅此而已。冷戰還是蘇聯模式共產主義的失敗和通過歐盟得以制度化的民主共識在歐洲的勝利。在中國，冷戰是由中國共產黨實施的政治和社會革命；在拉丁美洲，冷戰是拉美社會基於意識形態的分野而造成的嚴重兩極分化。」(頁17)

作為一部通史性的著作，《冷戰：一部世界史》以敘述為主，行文自始至終圍繞着中心論點展開，這是該著不同於一般通史性著作的一個顯著特徵。在2017年9月8日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舉辦的新書發布會上，筆者曾就該著的副標題向文安立提問：「如果將書名改為*The Cold War: A Global History*（《冷戰：一部全球史》），是否合適？」文安立在回答中強調，他在2005年出版的《全球冷戰：對第三世界的干涉與我們時代的形成》（*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如副標題所表明的，主要是為了說明冷戰對第三世界的深刻影響，寫的是冷戰的全球化<sup>⑥</sup>；而《冷戰：一部世界史》的視野則更為寬廣，涵蓋的內容更為豐富，包括東西方的冷戰歷史，也包含南北方的冷戰故事。

《冷戰：一部世界史》除導讀和結語外，共分為二十二章，以專題（如第六章關於朝鮮戰爭）和地區（如第十三章關於冷戰與拉丁美洲）為主題，按時間順序逐一展開。第一章講述十九世紀末大西洋世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意識形態的紛爭，第二章描述兩次世界大戰及其對歐洲和亞洲所造成的巨大破壞。在這兩章中，文安立分析了美國和蘇聯如何看待自身的意識形態和制度的優越。其中，美國珍視的是個人自由、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以及對集權的懷疑；蘇聯強調的是中央集權、對社會和公民的控制，以及反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二戰結束後，歐洲衰落、美蘇成為超級大國，主導了兩種意識形態及制度之爭。從第三章起，該著討論二十世紀40至60年代冷戰激烈對抗時期的一些主要事件，如中國共產黨革命的勝利、朝鮮戰爭、西歐與東歐在戰後政權的鞏固與經濟重建、非殖民化、越南戰爭和冷戰與拉丁美洲等。該著還探討了進入70年代之後中美關係緩和、東西方關係緩和以及冷戰結束等重大歷史事件。

文安立在這部六百多頁的宏篇巨著中，提出了四個相互關聯的主要觀點：第一，要了解冷戰的本質，必須將它看作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意識形態體系長期競爭的產物。這一競爭開始於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愈演愈烈。這是因為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在國內實施共產主義制度，並試圖將共產主義制度作為重建國際體制的另一個可選方案。與此同時，成功崛起的美國則試圖在世界範圍內推

文安立在2005年出版的《全球冷戰》主要是為了說明冷戰對第三世界的深刻影響，寫的是冷戰的全球化；而《冷戰：一部世界史》的視野則更為寬廣，涵蓋的內容更為豐富，包括東西方的冷戰歷史，也包含南北方的冷戰故事。

文安立認為，西方制度所帶來的巨大的生產力、西方物質財富的優勢，決定了西方意識形態在冷戰中勝出。文安立承認冷戰並不能解釋二十世紀所有歷史事件，但他認為冷戰是一個「塑造世界」的歷史現象。

廣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第二，隨着二戰結束，歐洲和日本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逐漸邊緣化，美國和蘇聯成為超級大國，其所代表的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形成的對抗嚴重影響戰後國際體系的走向。美蘇兩國直面對抗，試圖用各自的意識形態和制度來改變世界。這兩個觀點，文安立在2005年出版的《全球冷戰》中做了一定程度的論述，而在《冷戰：一部世界史》中做了更為深入細緻的闡述，並引出他的又一個觀點，也就是第三個觀點：美蘇的這種競爭是在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全球化轉變之中出現的。

特別是到了二十世紀70年代，這一競爭導致經濟、社會和技術領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革。對此，文安立是這樣勾畫的：「從189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一百年之間，全球市場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得以建立（或被摧毀）。人們目睹了他們的先輩只能在睡夢中見到的新技術的誕生，而這其中的一些技術被一部分人用來對另一部分人進行統治和剝削。人們的生活則經歷了令人無法想像的快節奏的變化，社會流動性和城市化幾乎無處不在。各種政治思潮，無論是偏左還是偏右的，都受到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的影響。」（頁5-6）文安立並不排斥美國贏得了冷戰勝利的觀點，但他強調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從十九世紀開始顯現的全球化和改變世界的功效，在二十世紀70年代之後更為強化，從而決定了冷戰發展的歷史進程和結局。美國贏得冷戰是因為美國恰巧站在這一歷史進程的獲勝一方；換言之，西方贏得冷戰，並不是西方意識形態和制度的

優勝，而是西方制度所帶來的巨大的生產力、西方物質財富的優勢，決定了西方意識形態在這場衝突中勝出。這一點也與他在《全球冷戰》一書中的觀點有所不同。第四，文安立承認冷戰並不能解釋二十世紀所有歷史事件，但他認為冷戰是一個「塑造世界」（World Making，這是他在導讀中使用的標題）的歷史現象，前所未有，應該深入探索。

文安立認為，冷戰雖然已經結束，但冷戰對當今世界的塑造影響深遠，而且揮之不去。在西方，儘管列寧主義已被完全摒棄，然而，2007至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以來，社會主義理念再度在西方受到青睞。文安立在該著的結語中滿懷憂思地寫道：「冷戰結束所沒有改變的是國際事務中的富有與貧窮之間的衝突。在世界的一些地區，由於宗教和種族運動的高漲，地區衝突更加激化，有摧毀整個社區的危險。深受冷戰年代的普世價值觀的影響（即任何人都可以過上天堂般的生活），這些團體變成了排外主義者或是種族主義者。」（頁628-29）

文安立以上觀點並非都是原創的，之前德國著名歷史學家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一直在討論十九世紀以來作為改變世界動力的全球化，已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歷史學教授馬茲利什（Bruce Mazlish）也曾注意到二十世紀70年代以來新的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對世界帶來的以技術為主導的綜合性變革<sup>⑦</sup>。然而，文安立將以上的觀點融會貫通，加以梳理和闡述，使這本冷戰史著作的理論性和深刻性得以彰顯。



### 三 學術創新

文安立在書中明確表示，《冷戰：一部世界史》是「講述全球冷戰在各大洲的歷史，從而展示不同人群所經歷的不同的冷戰衝突」（頁631）。該著關於冷戰的記述是全面的，在學術上也有所創新，筆者認為至少有三個方面：

第一，有一個宏大的時間跨度。文安立從編年史的角度，將冷戰分為四個階段：一、冷戰萌芽階段（1890-1917）：十九世紀90年代出現的第一次全球經濟大蕭條使資本主義制度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共產主義的理想和實踐趁機登上歷史舞台，這成為冷戰意識形態衝突的開始。二、冷戰初始階段（1917-1941）：期間主要歷史事件包括蘇聯的崛起、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以及二戰的全面爆發。由於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導致戰爭、經濟蕭條和壓迫，蘇聯的共產主義制度逐漸成為可供選擇的第二方案。三、冷戰激烈對抗階段（1941-1971）：儘管美蘇兩國在1941至1945年為戰時盟國，但蘇聯認為美國所代表的市場經濟和代議制民主制度的威脅並未消失。美蘇兩國所主導的激烈的冷戰對抗始於1941年，而不是過去學術界所公認的二戰結束後的1945至1947年間。四、冷戰衰退與結束階段（1971-1991）：在這一階段中，共產主義制度在蘇聯和東歐解體，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最終勝出。

該著在討論冷戰緣起時，並沒有以人們習知的歷史事件如雅爾塔會議、波茨坦會議、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以及1946年3月

伊朗危機為切入點，而是將冷戰淵源追溯到十九世紀90年代。文安立所關注的是意識形態、政治經濟發展在較長時間段如何影響和塑造二十世紀歷史進程，而這些寬泛的結構性發展沒有明確的起始時間。這意味着冷戰不僅僅是指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鬥爭，而且關涉到我們所處時代的方方面面。

第二，有廣闊的空間視野。文安立論述冷戰影響到全世界五大洲，很多國家牽涉其中，深受其害。在某種極端的情形之下，意識形態的純潔性與政治權力相結合導致了種族滅絕的大屠殺：柬埔寨的紅色高棉統治就是赤裸裸的「紅色恐怖」。在智利和一些其他國家，反共成為一種藉口，被用來維護殘暴的軍人獨裁統治，或為政客破壞國家政治體制中的民主程序打掩護。儘管美蘇兩國對歐洲、亞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影響有所不同的，但它們的影響大多是負面的。比如，冷戰對非洲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外部干涉、內部生亂和地區性不穩定；在拉丁美洲，冷戰對一些國家的內政有巨大影響。正如文安立在書中開篇指出的：「冷戰並不決定一切，但卻影響大多數的事情，而且這種影響往往使得事情變得更糟糕。」（頁2）

第三，關於美蘇冷戰誰輸誰贏的分析睿智獨到。文安立認為，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Mikhail S. Gorbachev）對結束冷戰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美國在當時願意與蘇聯通過談判來結束冷戰，這也很重要。他在結論部分這樣寫道：「說美國贏得了冷戰的勝利，我認為確實是這樣。說蘇聯或者說俄國輸掉

文安立將冷戰淵源追溯到十九世紀90年代，所關注的是意識形態、政治經濟發展在較長時間段如何影響和塑造二十世紀歷史進程，而這些寬泛的結構性發展沒有明確的起始時間。

如果說俄國的失敗釀成後果慘重的民族悲劇，那麼美國為這一勝利也付出極其昂貴的代價。如果說蘇聯崩潰之後的亂象使俄國人普遍覺得他們成了受害者，那麼美國在冷戰中勝出則使得美國人感到美國無所不能。

了冷戰，而且輸得很慘，這也是事實。」(頁621)這實在是耐人尋味的兩句話。在俄國，蘇聯的解體帶來大規模失業和基本社會保障的喪失，由強盜資本家主導的私有化過程給普通民眾帶來巨大災難。文安立認為，「至少事後看來，向資本主義經濟過渡對大多數俄國人來說，是個大災難」(頁623)。同時，後冷戰時期的俄國備受向東方擴張的「西方世界」不斷欺壓，被國際社會視為「賤民」。這也是為甚麼很多俄國人歡迎普京(Vladimir Putin)這樣的強勢領導人當政的原因。

另一方面，如果說俄國的失敗釀成後果慘重的民族悲劇，那麼美國為這一勝利也付出極其昂貴的代價。和許多其他學者一樣，文安立認為，後冷戰時期的美國歷屆政府未能成功應對它們面臨的新挑戰：要麼完全忽視這些新挑戰，要麼用對歷史的錯誤解讀來應對新的問題。如果說蘇聯崩潰之後的亂象使俄國人普遍覺得他們成了受害者，那麼美國在冷戰中勝出則使得美國人感到美國無所不能。由此，在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總統和政策制訂者一直讓美國扮演成一個在國際事務中「不可或缺的國家」(indispensable nation) (頁619)，利用壓倒性的軍事優勢去維持其所認可的世界秩序。

文安立認為，基於「美國勝利論」所催生的美國對外政策，帶來了消極後果。克林頓(William J. Clinton)政府所強調的全球資本主義優勢和繁榮，並沒有建立起基礎深厚的國際合作框架並使之體制化。對於那些「失敗國家」，特別是「冷戰時期的舊戰場(例如阿富汗、

剛果、尼加拉瓜)在冷戰結束後所發生的一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是漠不關心的」(頁618)。當這些「失敗國家」的問題逐漸顯現，特別是2001年9月11日恐怖份子對美國發動襲擊之後，美國迅速制訂了第二種應對方案，這就是小布什政府以美國軍事的絕對優勢，採取先發制人的戰略，入侵並佔領阿富汗和伊拉克。文安立認為，美國「是一個沒有殖民統治欲望的強國，但它事實上創建了二十一世紀的兩個殖民地(阿富汗和伊拉克)」(頁618)。他由此得出令人沮喪但發人深思的結論：「美國沒能很好地利用其冷戰勝利的歷史經驗為自己在後冷戰時期的世界定位。」(頁620)他感到十分遺憾的是，源於十九世紀90年代的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種意識形態的歷史性競爭本來應該有個「美麗的結局」(頁628-29)，然而，現狀卻令人堪憂。

#### 四 中國與冷戰

文安立對近現代中國外交研究也有很高的造詣，2012年曾出版專著《躁動的帝國：175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考察了1750年以來中國與世界各國交往的歷史<sup>⑥</sup>。文安立認為，深入了解中國對全面認識冷戰至關重要。

據悉，北京大學出版社將出版由北大歷史系副教授牛可領銜翻譯的《冷戰：一部世界史》中譯本。遺憾的是，北大版的《冷戰：一部世界史》將是一個刪減本，而刪除最多的是有關中國的故事，特別是

原書第九章「中國的災禍」(China's Scourge)將完全被刪除<sup>⑩</sup>。那麼，文安立原書中對二十世紀的中國與冷戰有哪些重要論述呢？

其一，關於斯大林與國共內戰等問題。1945年初，毛計劃與佔領中國東北的蘇聯紅軍配合，挑戰蔣介石的統治(頁139-40)。1945年底，當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派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赴華調停國共矛盾時，斯大林最初要求中共配合馬歇爾調停，以便讓蘇聯能夠順利獲得在1945年8月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國民政府做出的各種讓步。但是，中共拒絕配合蘇聯的外交政策，國共軍事衝突由此加劇。與此同時，美國逐漸採取明顯袒護蔣介石的政策，蔣由此變得大膽起來，不肯具體落實1945年初答應給蘇聯的讓步。隨着冷戰不斷加劇，1946年3月，斯大林決定從中國東北撤出蘇聯軍隊，可能是看到蘇聯這樣做將有利於中共軍隊在東北的發展；他也許是希望以此迫使蔣介石重新回到談判桌上(頁140-41)。1949年10月，毛澤東在北京建立中共政權。儘管蘇聯人要求中共謹慎行事，毛還是宣布中共政權為人民共和國，與蘇聯在東歐的衛星國一樣。經過毛的反覆要求，斯大林勉強同意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訪問蘇聯。毛希望通過訪蘇與蘇聯結盟，以防美國顛覆中共政權。不過，斯大林對中共的「階級基礎」缺乏信任。在斯大林的內心深處，他不信任中共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通過自己的努力而不是依賴蘇聯紅軍從而奪取政權。其後，雙方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但是毛並不高興，

因為在蘇聯期間，毛覺得蘇聯人對他頗為怠慢，沒有給予應有的尊重(頁142-43)。

其二，對建國初期中共政策的評價。中共建國初期在全國範圍所實施的革命暴力主要是為了達到三個目的：一、毛澤東希望摧毀中國農村傳統精英階層和城市資產階級的權力基礎；二、毛希望通過將外國人擠出中國，取締他們在中國的報紙、書籍和電影，將中國與非共產主義的外部世界隔離；三、毛希望通過大規模群眾運動來動員和鼓動年輕人參與建立一個以蘇聯為樣板的社會主義共和國。1950年夏，朝鮮戰爭的爆發可能使得中共鎮壓反革命的政策變得更加血腥。其實，暴力和血腥的成份一開始就存在，比如規定每個省要抓捕和處決多少反革命份子的指標，就是從二十世紀30年代斯大林的肅反運動中直接學來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最初的兩年中，中共政府處決了將近二百萬人，甚至連在中國的蘇聯顧問也認為這種做法過於魯莽草率(頁144)。

其三，有關中國與朝鮮戰爭問題。1950年4月，北朝鮮領導人金日成到莫斯科向斯大林提出武力統一朝鮮半島。斯大林同意了金的要求，但要他立即去北京爭取毛澤東的支持。毛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者，認為中共有義務幫助其他國家革命。同時，斯大林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無可爭議的領導人，毛不可能公開與之抗衡。尤其是中共剛剛通過暴力革命奪得政權，毛怎能拒絕支持朝鮮共產黨這個小兄弟統一祖國的請求？那麼，一向謹慎現實的斯大林為甚麼在此時改變立

文安立認為，深入了解中國對全面認識冷戰至關重要。隨着冷戰的不斷加劇，1946年3月，斯大林決定從中國東北撤出蘇聯軍隊，可能是看到蘇聯這樣做將有利於中共軍隊在東北的發展；他也許是希望以此迫使蔣介石重新回到談判桌上。

毛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者，認為中共有義務幫助其他國家革命。斯大林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無可爭議的領導人，毛不可能公開與之抗衡。尤其是中共剛剛通過暴力革命奪得政權，毛怎能拒絕支持朝鮮共產黨這個小兄弟統一祖國的請求？

場，同意北朝鮮進攻美國人支持的南朝鮮呢？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位年老體衰的蘇聯領導人愈來愈被錯覺所左右。晚年的斯大林常常會依賴幻想做決策，認為自己無所不能。其他一些因素，如美國對保護南朝鮮發出的前後不一的信號、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機中蘇聯未能達到預設目標、1949年蘇聯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等，也在斯大林的決策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管怎麼說，朝鮮戰爭是由於斯大林思想變化所致。如果斯大林不對金日成鬆口，就不可能發生朝鮮戰爭（頁168-69）。在朝鮮戰爭期間，很多第三世界國家並不支持美國。比如，印度從戰爭一開始就要求雙方結束戰爭，退回三八線兩側。但是，南非白人種族主義政府卻派兵參加聯合國軍。1950年11月，正是參戰的南非空軍飛行中隊的炮火導致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在朝鮮陣亡，儘管當時並不知道這一情況（頁177-78）。

其四，關於中蘇關係問題。如果沒有蘇聯的支持，中國在二十世紀50年代的巨大變革是不可能發生的。蘇聯對中國的援助項目不僅僅是莫斯科在蘇聯境外所給予的最大援助，相對說來，蘇聯對華援助項目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甚至超過馬歇爾計劃。用今天的價值來核算，從1946至1960年，蘇聯對華援助總值為250億美元，幾乎佔蘇聯每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但事實上蘇聯付出的代價更大，因為這個援助總量還沒有把技術轉讓、蘇聯專家在中國的工資以及中國留學生在蘇聯學習期間的津貼統計在內。儘管蘇聯援華總值

中大約18%來自蘇聯的盟國，中國也最終償還了蘇聯援助總值的大約15%，然而即使扣除了這兩部分，蘇聯對華援助仍然是空前的，對中蘇兩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頁237）。1954年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第一次訪華，決定在民用與軍事兩個方面大規模增加對華援助。中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三分之一的建設項目是由蘇聯和東歐國家出資援建的（頁238）。蘇聯對中國的影響包括各個方面：軍事、教育改革、中共對城市的管理和改造、民族政策以及農村政策等。中國的軍事建設中，有超過一萬名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在蘇聯受訓，蘇聯軍事專家同時在中國培養了無數的中國軍人。這使得中國軍隊在執行其對內的職能和作戰方法方面很像蘇聯紅軍（頁238-41）。

其五，對中共主政的總體評價。文安立認為，二十世紀的中國有個奇異的對稱，而這與冷戰意識形態是相關聯的。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共和革命被共產主義和戰爭壓垮；到了二十世紀末，共產主義被金錢和市場所顛覆。在兩者之間是破壞與重建、豪情萬丈與玩世不恭，血流成河幾乎從來沒有間斷過。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最主要的特徵是嗜血性，根據最新統計，二十世紀20至80年代由於戰亂和政治大屠殺而死於非命的中國人達到7,700萬，這其中大部分死於中國人自己之手（頁233）。共產革命與冷戰改變了中國，儘管這些變革並不全是中國領導人和人民所希望發生的。最主要的變化是「舊中國」的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混合社



會，包含中國和外國的成份，例如，共產黨以及其統治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是舶來品，關於家庭、教育和科學技術的新思想是外來的東西。中國革命最主要的特色是對人的改造、意志力的培養以及對救國救民良方的強烈關注。到了二十世紀70年代，愈來愈多的中國人發現毛澤東對理想社會的過度追求、對老百姓現實生活利益缺乏關注，使得中國革命偏離了正確方向（頁257）。

筆者認為，文安立對中國與冷戰的論述，大多是西方學界已經了解的，他的評介也是比較中肯的，並沒有對中共政權作出過度的批評。當然，他的語言有些犀利，所表達的觀點與中共官方對相關歷史的論述相距甚遠，這可能是這部分內容不能為中共當局認可，以致該書中譯本有所刪節的主要原因。

## 五 餘論

作為一部為普通讀者撰寫的通俗性冷戰史讀本，《冷戰：一部世界史》文字優美，言簡意賅，加之諸多歷史趣聞的點綴，使其既真實又清新可讀，堪稱宏大歷史敘事的成功典範。求全責備，該著不足之處如下：由於篇幅限制，文安立對諸多歷史事件的討論只能略略涉及，點到為止（頁17）。關於冷戰為何持續如此之長的問題，儘管文安立對蓋迪斯關於冷戰是一個「長和平」（Long Peace）的提法頗有微詞（頁3），他的答案是由於核武器的存在所致，但並沒有對核武器為甚麼使冷戰得以持續提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此外，該著還是沿用傳統外交史的寫法，以國家和上層精英的活動為主。區域研究的專家肯定也很不滿意，因為文安立對拉丁美洲冷戰歷史敘述過於簡單，也沒有引人入勝之處；印度尼西亞這個與冷戰鬥爭很有關係的國家及其總統蘇哈托（Haji M. Suharto）在書中只是一筆帶過。文安立的著作一向以使用多國檔案著稱，該著也不例外，充分利用了冷戰結束以來冷戰研究的成果，但也許是由於篇幅所限，該著註釋部分過於簡單；很多論述依賴於已經發表的學術成果，但沒有一一標註出處。例如，筆者前面談到文安立關於中蘇關係問題的討論涉及很多數據（頁237-38），卻沒有註明資料出處。然而，瑕不掩瑜，文安立的冷戰研究是功勳卓著的。

2005年可以看作是西方冷戰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年份。在這一年，蓋迪斯和文安立分別出版了《冷戰：一部新歷史》和《全球冷戰》兩部著作。《冷戰：一部新歷史》代表以蓋迪斯為首的以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對抗為視角的冷戰研究學者的最高成就。這些學者關注的是華盛頓和莫斯科如何制訂和實施冷戰政策，使用的主要是美蘇兩國的官方檔案。《全球冷戰》最大的貢獻是將冷戰研究拓展到冷戰時期美蘇兩國在第三世界的爭奪，凸顯冷戰對第三世界的深刻影響。在此之後，不少冷戰研究學者開始關注一些新的研究領域，例如「非殖民化」、「全球南方與冷戰」、「亞裔美國人與冷戰」、「中蘇之間在第三世界爭奪的冷戰」、「冷戰時期中美在第三世界的爭奪」等等，這些研究非常重視使用多國多語種檔案。

文安立認為，二十世紀的中國有個奇異的對稱，而這與冷戰意識形態是相關聯的。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共和革命被共產主義和戰爭壓垮；到了二十世紀末，共產主義被金錢和市場所顛覆。

近年來，有學者認為冷戰研究將成為殖民研究 (colonial studies) 的一個分支領域<sup>④</sup>，文安立對此也有同感。他在《冷戰：一部世界史》的導讀部分這樣寫到：「很可能未來的歷史學家會降低冷戰的重要性。」(頁6)也許我們可以說，《冷戰：一部新歷史》是蓋迪斯對傳統冷戰史學研究的總結，而《冷戰：一部世界史》是文安立對二十一世紀以來冷戰研究新方法、新領域的全面概括。在冷戰研究的重要性或將被弱化之前，文安立試圖為冷戰研究做出最後的總結。

《冷戰：一部新歷史》是蓋迪斯對傳統冷戰史學研究的總結，而《冷戰：一部世界史》是文安立對二十一世紀以來冷戰研究新方法、新領域的全面概括。在冷戰研究的重要性或將被弱化之前，文安立試圖為冷戰研究做出最後的總結。

### 註釋

① 冷戰研究經歷了三個重要階段，並相應形成三個不同的學術流派：一、1950年代的傳統學派 (Traditionalism) 或正統學派 (Orthodoxy)，其主要論點認為冷戰源於蘇聯，美國為了捍衛民主制度，遏制共產主義擴張而被動捲入冷戰。二、1960至1970年代的修正學派 (Revisionism)，認為冷戰並非源於共產主義擴張，而是美國式帝國主義擴張的結果。該學派傾向接受經濟決定論的影響，認為美國的對外政策受壟斷資本集團的操控，目的是在全球建立其經濟霸權。三、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崛起的後修正學派 (Post-revisionism)，既繼承了修正學派的觀點，也吸收傳統學派的說法，認為冷戰是傳統均勢體系失衡所致，美蘇雙方都應該對冷戰的起源負責，但蘇聯的責任大一些。

② John L.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③ John L. Gaddis,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5).

④ Caroline Eisenberg, "Review of *We Now Know* by John L. Gaddis",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4, no. 4 (1998): 1462-64; David Painter, "A Parti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Geir Lundestad, "The Cold War According to John Lewis Gaddis", *Cold War History* 6, no. 4 (2006): 527-34; 535-42.

⑤ Tony Judt, "A Story Still to be Told",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3 March 2006.

⑥ Odd A.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⑦ Jürgen Osterhamme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Bruce Mazlish, "Comparing Global History to World History",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8, no. 3 (1998): 385-95.

⑧ Odd A. Westad,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該著榮獲2013年美國亞洲協會 (Asia Society) 圖書獎，筆者曾發文推介，參見夏亞峰：〈十八世紀以來的中國與世界——評Odd A. Westad,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4年6月號，頁115-26。

⑨ 幸好台灣將出版《冷戰：一部世界史》的全譯本，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

⑩ 參見Nikhil P. Singh, *Race and America's Long War*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夏亞峰 東北師範大學東師學者講座教授，美國長島大學教授。